



我在这里

曲梵 著

长江出版传媒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我在这里

曲梵 著

 长江出版传媒 |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在这里 / 曲梵著. -- 武汉 : 长江文艺出版社,
2016.9
ISBN 978-7-5354-8922-7

I. ①我… II. ①曲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49705号

责任编辑: 谈 骁

责任校对: 陈 琪

封面设计: 吴亦童

责任印制: 左 怡 包秀洋

出版: 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: 430070

发行: 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话: 027—87679360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印刷: 武汉市福成启铭彩色包装有限公司

开本: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 印张: 7 插页: 2页

版次: 2016年9月第1版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

字数: 131千字

定价: 29.00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 027—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目 录



光阴里的南门	1
生灵之间	23
谁在千里之外	34
乡村人物	45
每个人是不一样的	57
近 乡	73
向 内	94
别 处	124
那一年青春动荡	139
务虚的布局	148
几种状态	155
白衣飘飘的年代	164
读 药	183
有关电影的痛痒	204



光阴里的南门

一

说吧，记忆。

像被鸟衔走的一粒种子，我被种在南门。它处于城市和农村的结合区域，一半连着街市的闹热，一半承接农村的粗糙，守着小城的南边。我喜欢它这种存在方式，闹中取静，边缘，不规则。若是在十年前，你会看到南门陈旧的面容，那些灰色的房子，空中交错的电线，狭窄的街巷，梧桐树叶在街边流浪，偏僻的斜坡上青草野蛮生长……地理位置，人群组成，构成南门一带陈旧、粗粝的气质。这大概是边缘的结果。在群体中，我似乎保持着类似南门这片地域生长的姿态，不喜欢站在人群中间滔滔不绝，不喜欢成为众目睽睽的对象，更合适在边缘行走，当一个听众，微微一笑，在适当的时间选择离开。听众是一个迷人的角色。如果能攫取某些有趣的部分，意识会汹涌澎湃，然后进入某种想入非非的状态。

对于我妈来说，选择从农村搬到贴近小城的南门，是一个清醒的决定。这几乎是她年轻时代的一个梦想，人生的重要一步。十多年前，她为自己的心愿做出最大努力，成了一个“城里人”。同时，离开不合心意的人际关系，实现阶段性的生活目标，成为她的命题和选择。她是个有点抱负不甘平庸的人。我爸更像是继承了庄子的风格，友善，诚实，与世无争。他没有经历看山还是山、看水还是水的那种修炼，禀赋使然，他有无公害的人品。

南门的日常生活就这么开始了。东方发白之际，一辆车子载着高高隆起的物件，风风火火地从村子跑到南门。搬新房是讲究时间和程序的，我们守住某一时刻，集体向屋里进发，我爸拎着煤炉，我妈拿着家用物品，我背着一个书包，看似随意的行为，实则埋藏着很强的仪式感和寓意。我们不善于用语言直接表达生活的喜和苦，更多的是埋在心里，心知肚明。花岗岩地板、窗子、墙裙亮闪闪的，房子里透着小小的喜悦，话语里带着甜味，我们认真地围坐在一张长桌边吃饭。

小小的喜悦仅仅持续了一小段时间，没多久，闭合的一百多平方米的风子里，空洞洞的无聊像一张蜘蛛网轻而易举地将我捕获。我往楼下跑去，楼道里空空荡荡，人行道长着一副孤寂的面孔。然后，我抱着篮球，在球场上独自打球，心脏加速跳荡，额头沁出汗珠。在一段时间内，我用这种激烈的方式抵抗无聊消磨时光。玩累了，就坐在一棵松树下，把玩尖细的松针，想象某时某地碰到村里的熟人或者亲戚，这些幻想一直没能得逞。实际上，我喜欢在村里和伙伴们混在一起，钓鱼，捉



鸟，打蛇，游泳，爬隧道，玩扑克牌……我们和动词结下不解之缘。

凹凸不平的不适感，经历一段震荡后，被时间一寸寸磨平。一年以后，我换了个人似的出现在村子里，衣着干净，沉默寡言。有个玩伴趿拉着拖鞋，脚上沾着泥巴，朝我使了个眼色说：“呀，城里人来了。”他的这种说法，让我心里不是很舒服，但我还是朝他笑了笑。我们三心二意地站在路边，十多年摸爬滚打的交情中间，生出一道沟壑。昏暗的屋子里，我注意到长桌上飘浮的一层油污，木制的物件沉浸在幽暗中，苍蝇肆意飞舞。我在心里和昔日架起一堵墙。许多年后，等我回顾这些细节，一个略微复杂的问题油然而生：从不适应小城生活，到不适应老家生活，再到现在念想老家，是什么造成了微妙的变化？

毫无疑问，我所挪动的生活是乏善可陈的。对一些人来说，生活位移会产生强劲的精神推力，无论是主动性的吸引，还是被迫式的离开。比如，1888年2月20日，巴黎没发生什么大事，这一天，凡·高决定“逃出巴黎”，从里昂车站踏上南下的火车，到法国南部普罗旺斯地区的阿尔。凡·高在写给弟弟的信里说：“我想在更加晴朗的天空下，看看大自然。”“在南方的太阳下，整个大地都在燃烧，淡黄色，硫黄色，绿黄色。”不起眼的黄色，被凡·高重视为太阳之光，在那里，他完成了《向日葵》《房间》等一批重要画作。比如，1911年10月，里尔克入住杜伊诺古堡，他爬到高出亚得里亚海的波涛约二百英尺的地方，蓦然觉得呼啸的狂风中似乎有一个声音在向他喊叫：“是谁在天使的行列中倾听我的怒吼？”他立刻记下这句话，没费什

么气力，鬼使神差地续下了一连串的诗句。然后他返回屋内，到了晚上，第一首哀歌诞生了……而我在南门，获得了什么精神产品？挪动生活带来的内部影响像一阵风轻轻吹皱池面，用不了多久，水面归于平静。我们过着类似的生活，咣的一声关上防盗门，在一百平方米的地板上走动，观看时政新闻，理个千篇一律的发型，身体发福，务实。

常识告诉我们，我们的生存只不过是两个永恒黑暗之间瞬息即逝的一线光亮。在这两个深渊之间，我们把残存在意识中的片段叫作“记忆”。研究表明，当我回忆年龄更小时的那些场景和事件时，它们更具乐趣和温度，比如常到我家来玩的某个年轻人，他爆炸式的笑声会达到余音绕梁的效果。他牙齿崎岖不平，我盯着他的嘴巴，跟着哈哈大笑起来。在我看来，那简直是一种残缺的美和可爱。村里一些无所事事的年轻人，常在尘土飞扬的泥路边打台球，花色球在桌子上翻滚，他们喜欢说：“你猜，这球能进吗？”我念起咒语，说：“不可能，进了我吃掉它。”他们把身子趴在台球桌上，目光炯炯，果断出杆，台球入袋后，得意地打一个响指……如果说，记忆深处贮藏的快乐更加简单，纯真更加充盈，那么我们是否走在丢失的路途上？存在价值的空间大面积被别人占据，假扮一个不是“我”的人，那些遭遇会留下什么记忆？



二

居住南门的第二年，我成了一个中学生。

若干年后，等我回望这段时间，仍然清晰记得去学校报到时的场面。操场上黑压压地站满了人。家长们拿着入学通知书，在黑板上寻找孩子的名字。闹哄哄的场景里，夹杂着各式方言。其中，老城区的方言充溢着傲然的气质，其余各地的语言就显得比较乡土和在野。学校的名气大，全市各地的生源都往那里拥挤，同学们的咬字吐音也就五花八门。

骚动的青春期，脸上长痘的孩子开始爱慕虚荣。我们关注同类的穿着、零花钱、家境，暗自产生攀比心理，发酵“面子”这个概念。语言代表身份，为了消除某种排异性和孤独感，我们受着感染，慢慢淡化各自的方言，取而代之的是城区语言。在同学的玩闹中，它时不时地显露出居高临下的气势。汉字在方言中的指向和意味很有意思，比如“醉”字，同学们带着鄙夷的语气说：“这个人真醉！”这里的“醉”不是喝醉酒的意思，而是说这人很厉害、牛皮哄哄。如果考试考得很好，我们就说：“你这么醉！”一个人理了新颖的发型，或者在头上打了啫喱水，我们就说：“你这么醉！”语气里带着不可一世、挑衅、小流氓的味道，惹得我们学而不厌。我记得一个姓郭的同学，此人颇为暴戾，语气狂妄，动不动就说“这么醉”，还喜欢拿钢筋钳似的手从背后绑住同学，半开玩笑半当真，这种蛮横的身

体入侵时常引发局部地区的战争。我从郭同学的行为处世上认识到，他喜欢用轻蔑的态度对待草根的方言，狂躁不安占据着他的内心空间。许多年后，我又碰到了郭同学，当年那个凶神恶煞的小子，居然考进警校，在异地当警察。这意味着他将脱离我们当地的方言，进入一片陌生地域，不知道在异地，郭同学对于语言象征的身份会做何感想，因为在异地他已不是作为主体而存在，他失去了某种优势。

在那所中学，我度过了三年并不快乐的时光。站在一群骚动的青少年面前，老师的脾气比较火爆，也可以理解为他们的职业惯性或者是负责的工作态度，因为中学阶段是容易误入歧途走错方向的人生阶段。一个漂亮的英语老师，除了擅长说一些我们听不懂的英语外，还擅长骂人，我们在背后称她为“机关枪”。数学老师中午喝过酒，开宗明义地跟我们讲：“你们最好安分点，我喝过酒了，最好别让我出手。”他把量角器往讲台上一扔，桌面扬起细碎的粉尘。如果做错数学题，他就瞪大眼睛，一拳打到同学的脖子。我们把那记拳叫作“龙拳”。特别是对我们这些操持着乡下口音的孩子，一些老师在潜意识中是有偏见的，那时的城乡观念还很突出。这些片段烙印在我的记忆里，成为不时观照的教材。若干年后，我成为一名教师，始终坚持着一些原则，尽量避免学生遭遇到我曾经的遭遇，教书育人当以慈悲为怀。

一个地区的开放，最直接的是物质打开，深层次的文化和精神交融会缓慢得多。在我们村，方言依然保持着五十年前的味道。那种语调坚硬、直接，类似于日语，还闹出过笑话。一



个操持我村方言的商人到香港办事，快速倒车时，服务生突然拦住他。商人下车和服务员理论：“车没撞坏，人倒吓坏了。”商人说话的语速很快。那个服务员二话没说，当即就给他一鞠躬，嘴里冒出一个字：“咳！”原来，服务员把商人当成日本人，真是让人啼笑皆非。自从走出村子，我的口音经历了各式语言的感染，还通过了普通话二甲考试。曾经，我以为那种方言是卑微的，羞于在混杂的人群中操持。现在，我又重视它，所谓“越是民族的，越是世界的”，有时用方言和同事开玩笑，发出一些陌生的语音，让他们愣在那里。

任何事物都有其局限性，不论尊卑，方言隐含的乡愁和独特性是最大价值。

语言体现尊重。

三

有些现象总是很难解释清楚，哪怕我们用显微镜、探测仪等先进设备去观测化验，未必能得出究竟。在科学探照不到的地方，人文的、神秘的东西会冒出来。比如，风向、水质、土壤和地理这一类寻常不过的事物，会对一个群体的性情产生怎样的影响，从而累积成怎样的村落脾气？我们很难给出什么确凿的证据和定义，只能靠猜测。

华夏存有明显的文化自大感，以“中央之国”自居即是一个例证。放眼苍茫，人们认为自己处于世界之中心。这种地方

意识、本我意识，一并涌进了村落。在我的体会当中，“我们村”和“他们村”几近于相对，有宽阔的距离感，但又全然不是敌人，处于若即若离的状态。以我们村为例，村人的性格比较温和，村内极少发生斗殴事件，但是在隔壁村子的居民看来，这可能是一种懦弱。同样，我们对隔壁村人的衣着、行为方式等方面抱有一些看法。比如，他们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，穿着方式特立独行，里边的衣服长，外边的衣服短，裤脚一只高一只低，颇有现在街舞选手的风范。在那个时代，这样穿着势必会让我们村的人笑话。他们性格刚烈，团结，擅长纠缠，一旦发现村里人被外村居民欺负，便倾巢出动，乌云一般压过来，和你理论一番，乃至发生群体性事件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，我村的一名猎人，在管山期间发现一外地村民上山偷树。于是鸣枪警示，叫他停下脚步。那人大概是被枪声吓到了，一路狂奔。冷酷的猎人朝他开了一枪。这一枪，引发了两个村子的一场群殴。其中，住在我家背后的一个年轻人，掀翻了担着死者的木板。其实，这事跟他没有切实的利害关系，他只是被狂热的气氛冲昏了头脑。一些年后，年轻人在放石炮时，被滚落的山石击中头部，一根钢筋刺穿了他的胸膛。其他人等安然无恙。人们回顾年轻人的时候，总是说：那年，他不该那么冲动。有些陈年旧事，听起来很神秘。

随着物质条件的优化，村落某些可爱的特质正在改变和消退，因为许多人离开村庄，深入城市腹地，人们走进同样的电梯，推开同样的窗户，说出同样的新闻，实行同样的购物计划，并且减少彼此之间的往来。我看到社区里的居民呈现散开的状



态——我们熟悉彼此的面孔，但是叫不出对方的名字。

我们很少打招呼。

四

南门在经历改造。

城市的触角，向四面八方铺展。那些低矮、杂乱、陈旧的生活场景，一年年撤离。较早前，走出我所居住的小区，三四十米外架设着铁道线，绿皮火车蛇一般迅捷滑过，车厢里的旅客用一种平静的目光观望我们，我们用一种猎奇的心态观察他们，实际上，我们都想看到超越常规的画面，或者说是渴望差异，比如发现一片夺人眼球的场景，看到一个美的或者新奇的人。锈迹斑斑的铁轨，伸向苍茫远方，在我茫然的远望里，构成一场诱惑。轨道一侧，生长着蓝色、黄色的寂寞小花，在火车的轰鸣里，轻轻颤抖。我们大概是寂寞的人，爱好在铁路边看火车。表弟骑坐在我爸的肩膀上，我爸问表弟：“火车有多长啊？”表弟张开手臂，比画着说：“这么长，这么长，这么长。”在一个孩子眼里，火车的长度，约等于他环抱的尺寸。几年后，铁轨易道。再过几年，立交桥消失，平房消失，突起的路基消失。

城市的日新月异，正在丰富我的陌生感。那些拔地而起的大楼，木楞楞立在某个街口，墙面上镶嵌着众多有色玻璃，在阳光的炙烤下，发出现代性的提示。我的意识频频回头。城市

的某个角落，很可能在几个月后换成另一幅图景。所谓时尚先进的元素，一层层覆盖我们的意识。以前的小区，我们称之为村，把地域文化和村名结合起来，比如“苜蓿新村”，相传美女西施的父亲在苜蓿山上砍柴；“蠡湖新村”，“蠡”大多是跟范蠡有关。1990年代后期，开发者意识到村子的叫法有些老套，往往取名为“某某花园”，能够生活在一座花园而不是一个村子里，生活品质似乎有提升。现在小区的名称更趋豪华，比如“金鼎学府”，学府和文化搭上关系，俨然是上了档次；“伊美豪庭”纯属富人居住区，工薪阶层在看房时显然会底气不足。开发商打出各种旗号，把房子和就学、商场、自然环境等等密切联系起来，挂出大幅精美气派的广告牌，“南门深处居英才”“借鉴南加州古典住宅的建筑手法……独享尊贵与奢华”“核心地带，跳楼价”，等等。它们正在为购房者提供身份感和尊贵感，以便尽快让空荡的房屋蒸腾人气。但在看似把顾客作为上帝的商业背后，我不止一次见识背后存在的阴影：某个开发商突然逃跑，导致一大批交款的工薪阶层哭干眼泪，一个男生由于受影响被迫解除婚约；开发商明目张胆地填埋江河，啄食公共资源，肆意扩大私人观景平台……

在城市变迁的另一侧，一群人的生活持续在底层。我家附近，有个叫阿毛的修车人。阿毛的头发鬃曲，衣服长年沾着油渍。他的话语不多，眼神很少落到别人身上。去店里修车，如果是维修小故障或者提供一点帮助，他从不收费。房子的外半间是他的工作区域，里半间是他的厨房兼卧室。有次，去他那里修车，聊到买房的问题。阿毛无奈地耸耸肩说：“我哪里买得



起。”对于这类相对沉默的人，我有一种基本的认识，他们脾气中有善意的元素，同时又具有某种不确定的爆发性。瘦弱的女儿常常跑到外边玩。阿毛的火气就蹿上来，动不动把孩子训哭。我就开玩笑地说：“毛，你修车的时候那么耐心，教育孩子有点暴力。”他嘴角往上一翘，面部肌肉松动一下，笑了笑。

如果把生存的光线压得更低，可以看到几乎失去生活尊重的人，每座城市都有。有次，我去附近的滴水禅寺静心。那是在半山腰上，我把汽车停在一处偏僻的寺院外，在车里喝茶翻书，然后在禅寺内走动。在庄严的氛围里，在荒山野林，毛茸茸的欲望会暂时消退。禅寺外的空地上，躺着一个乞丐，腿部骨骼严重变形，颧骨突出，面色发黑，像一只受伤的小兽。我认识他，在某条繁华的街上，他曾经在那里行乞，脸上爬满苦难的表情。现在，他的身边多了一只录音机，放着酥松绵长的佛乐。也许，他知道人们在礼佛、祈祷后，会产生适当的同情心和善心。他的目光伸向我，那一刻，他抬高呻吟的音调，抬高对生活的痛苦热情。我把口袋里仅剩的三枚硬币交给他，由于不敢正视苦难，把目光瞥向一侧。我的心里涌现出一点帮助别人的快乐。但是，走了一阵，发现五六个乞丐以同样的面目躺在地面上，同样放着大慈大悲的音乐，同样把求援的目光痛苦地伸向我。我默默朝前走，眼神朝向另一侧。我的想法多么荒谬，之前，我仍是一个行善的人，为自己的捐助生出一点小喜悦，但是接二连三的苦难，已不在我的视线之内。我在躲避什么？下山路上，更多虚构的人晃动在我眼前，他们因为出资建造禅寺而被铭刻在石碑上，受着宗教之名的呵护，但是他们

和我愿意救助更多残疾的失去尊严的人吗？我们的同情心多么廉价，还带上了附加值。“普度众生”的事业，只能由菩萨来完成。

城市的涌动，更多是物质层面的。深入某些细部，它的脆弱不堪一击。纽约和耶路撒冷，是个难以熄灭的主题。

五

我爸在城郊捡到一块荒地。如获宝物。

也许，基于饥饿和生产方式的影响，出生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，对土地抱有普遍的热情。即使在长时间进入城市生活后，回归的声音依然响在耳畔。荒地起伏不平，杂草丛生。我爸做了一个平土的道具，像一头牛，前倾身姿，脚步陷在肥沃的淤泥里，一步一步平整土地的胸腔。每天下班后，他骑车赶到荒地，然后披星戴月地操练种植手艺。劳动是上天给予我们的教育。受着土地沉默教育后的人，其身心会发生小小的变化。他可能感到疲倦，然而知足；感到繁忙，然而蕴含希望。很多次，我看到劳其筋骨后简朴的父亲，洗净身上的污垢，给自己泡一杯绿茶。绿茶的色香味俱全，在茶几上氤氲热气。他把茶杯承接到嘴边，眯眼观察杯面堆叠的茶叶，然后合拢嘴唇，轻轻呼气，吹开圆形的水面，像白桦林里的一头鹿低头面向春天的湖面。茶水进入喉头的时候，发出一记类似赞叹的声音，那声音透露出舒张和满意。



我一向佩服农人的种植技艺，他们总是有条不紊，对植物生长和收获充满把握，对节气和时令了如指掌。播种，锄草，施肥，收获，春华秋实，水到渠成。不像高楼里办公的人群，接到一项项新任务后，心里堵塞焦虑或者紧张。我爸乐意跟我们反馈庄稼的生长情况，“丝瓜吸收养分的能力特别强，旁边的菜蔬营养不足”“近几日，四季豆爬架的速度很快”“番茄连片长着”……偶有一些成长的意外，若是无法疗救，就随它去吧。在他的语言刺激下，我穿着球服，背着双手，终于站到了田间地头。庄稼们整齐排列，等待我的检阅。但是，许多植物的长相和名称在记忆词典里丢失，我的弱智显露无遗。一阵风吹过，一些叶片在风里微微蜷缩，像是捂着嘴巴在笑我。

我蹲着身子，用宏观和微距的形式，给大片植物拍下照片。豌豆的须纤细、缠绕而有律动感，它们的花瓣、花蕊呈紫色或者红色，星星点点地飘浮在绿色世界里，像纯洁、清新的少女，未受外界诱惑的污染。青菜幼苗，从土地里钻出来，茎里夹杂淡黄色和绿色，顶端举着两瓣小叶片，平直或者歪斜地伸展成一个个阳光、舒展的“丫”字，借由稚嫩的身躯冲破泥地下的暗黑。还有一些植物，它们的花蕊、花瓣、叶片、花茎，让我对应联想到人的器官、属性和气质，其相似度令人惊异。

而植物是沉默的，只在一些细节上告诉人类——彼此间的互通互融。它们总是向阳而生，把小小的面孔朝向太阳。阳光、雨水、土壤、肥料，便可以催生蓬勃活力。田间的动物则不同，它们跟人一样，为了生计四处奔走，有时还会被人类惊出一身冷汗，乃至不幸丢失性命。麻雀披着卑微的灰色，胆小，警惕，